



中国出版论丛

“实践理性”即伦理道德行为的规范。

自然哲学家是玄学说朝人而月亮。康德哲学是主观主义。时间是意识所具有的主观范畴。黑格尔称之为德国革命的德国理论。

尔 体系是唯心主义的方法。是辩证的。绝对精神是宇宙的理性。绝对的思维。只有上帝的宗教。

自然所：理性绝对精神外化。自然所：有了经验。

自我认识：理性绝对精神向人类社会对发展。社会发展到社会发展的所

取，自己的丰富性显示出

自己认识了自己。通过

宗教哲学，认识自己。

对立的斗争；

数量转化；

否定的否定。

费尔巴哈 唯物主义，不承认是唯物主义者。

批判宗教，很精彩。批判唯心主义。人本主义创立。受

出版文集

陈翔伯

147091

G230-53
95-46

陈翰伯出版文集



中国书籍出版社

• 北 京 •

出版人 洪忠炉
责任编辑 朱 宇
封面设计 张守义
责任校对 陈俊珩

陈翰伯出版文集
CHENHANBO CHUBAN WENJI

陈翰伯 著

*

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西绒线胡同甲7号)

邮政编码: 100031

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850毫米×1168毫米 32开本 6.125印张 145000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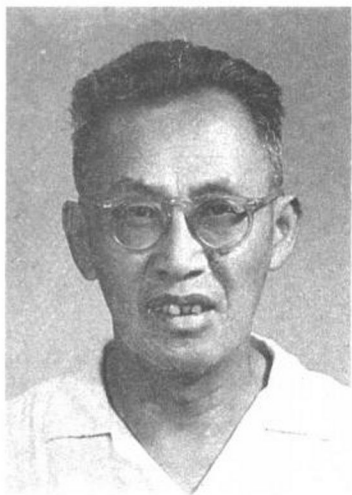
1995年6月第1版 1995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册

*

ISBN 7-5068-0207-4/G·93

定价: 8.00元



作者简历

陈翰伯，祖籍江苏苏州，中国共产党党员，1914年生。1932年9月在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读书。从“一二九运动”开始在党领导下从事进步的新闻出版工作。三四十年代曾先后在《西京民报》、《西北文化日报》、《时事新报》、《文汇报》、《新民晚报》、《联合晚报》等报社任总编辑。全国解放后，历任新华通讯社总社编委兼国际新闻部主任，新华通讯社新闻干部训练班主任，北京新闻学校副校长，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宣传处副处长，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兼总编辑，文化部出版局局长，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副局长、代局长，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1982年9月当选中国共产党十二大代表，1978和1983年当选为第六、七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1988年8月病逝。

编者前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出版事业得到了很大发展；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改革开放，发展非常迅速。不仅发展的规模和速度是历史上空前的，而且出版的总体质量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现在可以说，在我国已经初步形成具有全国规模的，包括图书、报纸、期刊和音像等门类齐全的，编辑、印制、发行、物资供应、专业教育和科研各个环节相互配套的出版事业。和世界各国相比，我国也已跻身于出版大国之列。

事实说明，出版事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其重要性越来越清楚。1983年6月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把出版工作推到我党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出版工作日益成为广泛深入地进行宣传教育的有力工具，成为促进经济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的重要手段，成为向人民提供丰富多采的精神食粮的重要桥梁。出版事业既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条件。出版事业的发展，要由经济、文化、政治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来决定，同时又为经济、文化、政治各项事业的发展服务。出版事业的状况如何，不仅是出版部门的局部问题，而且直接关系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

DNZ 4/104

摆在我们广大出版工作者面前的重要任务是,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社会主义的出版方向,加快出版改革开放的步伐,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逐步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版体制,进一步发展繁荣我国的出版事业,更加有力地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任务服务,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认真研究新中国 40 多年来丰富的出版实践经验,从理论上加以总结和提提高,进一步揭示社会主义出版工作的规律,这是加快出版改革、发展出版事业的重要条件。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国家出版行政管理机关先后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有着丰富的工作实践,他们的讲话、报告和文章,曾经具体地影响和指导了一个时期的出版工作。虽然其中某些内容难免历史的局限性,但是,在总体上,不失为一笔反映我国出版历史进程的宝贵财富和研究当代出版事业的可贵资料。有计划地、系统地加以整理出版,对推进出版科研工作、从理论上总结出版实践经验,对加快出版改革开放、发展和繁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出版事业,都是有意义的。

基于以上认识,经袁亮同志建议,新闻出版署同意,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和新闻出版报决定联合编辑出版《中国出版论丛》。计划选编建国以来国家出版行政管理机关部分负责同志有关出版工作的讲话、报告和文章,一人一卷,计划 10 卷左右,两年时间完成。这套丛书由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这是我们首次编辑出版这类著作,一定会有不妥之处,希望出版界同仁和广大读者指正。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
新 闻 出 版 报

目 录

编者前言

出版工作

动员起来 订好出书规划·····	(3)
最初一言·····	(7)
团结协作,修订《辞源》·····	(12)
做好修订《辞源》的工作 ·····	(16)
关于编写《汉语大词典》的请示报告 ·····	(20)
克服困难,编好《汉语大词典》·····	(21)
关于加强《汉语大词典》工作 ·····	(26)
同舟共济,鼓浪前进·····	(29)
在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	(31)
谈旅游出版工作 ·····	(53)
前进中的中国图书出版工作 ·····	(69)
谈书籍装帧 ·····	(76)
为少年儿童出版更多更好的课外读物 ·····	(81)

评论·杂感

杂谈开书目 ·····	(87)
关于学习理论的若干问题 ·····	(90)
老生常谈话文风·····	(105)
两周年告读者·····	(107)
整理古籍 任重道远·····	(111)

订交五十年·····	(113)
鼓励 and 希望·····	(115)
三联书店五十周年纪念·····	(116)
· 新的地方志·····	(119)
书店好事三数则·····	(121)
全国人民都要养成读书风气·····	(123)
书展上的翩翩联想·····	(125)
一个外行人兼热心人在印刷世界的漫游记·····	(127)
一件小礼品·····	(132)
告慰斯诺先生·····	(134)

自传·回忆录

自拟小传·····	(141)
历史召唤我们前进！ ——《一二九运动史》代序·····	(143)
从小读者到老编辑·····	(148)
在白区办报·····	(152)

附 录

青春办报·皓首出书

——纪念陈翰伯从事新闻出版工作五十年·····	(175)
后记·····	(191)

出版工作

动员起来 订好出书规划

现在各方面都在进行规划工作。上个月开了出版工作座谈会，有几天是谈规划的事。散会以后，我们向各直属出版社传达过规划问题。现在要求全体编辑同志进入角色，全力搞好规划，大家都来参加制定规划的工作。

我们提交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上讨论的出书规划，是初步的，仅仅是开步走，其中也还有不少缺点。那个规划开列的书目不平衡，缺门较多，也来不及到社会上征求意见，来不及同出版社商量。它只是一个起点，起启发思想、开阔眼界的作用，没有最后落实。当然，启发也很重要。现在，我们要接下去干，要发动群众认真研究制订规划，讨论落实。

要搞好规划工作，必须首先认识到，制订规划本身就是对“四人帮”的批判，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过去“四人帮”干扰破坏，不能搞规划。搞革命回忆录，就说是“为‘走资派’树碑立传”，搞外国和古典的东西，就说是“宣扬封资修”。可见，不清路线是非，不解除“四人帮”的精神镣铐，就搞不好规划。现在正在进行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正在批判反革命的“两个估计”，正在为制订出书规划创造良好的条件。但我们也不能再等了。应该一边战斗，一边订规划。订好规划，也有利于进一步分清路线是非。我们的规划要把批“两个估计”、分清路线是非、抓纲治国等思想表达出来，要正确处理普及与提高，群众需要与专家需要，重版与新著等关

系，要有章法。制订这样的规划，就需要多动动脑筋，不要把它当成事务性、行政性的工作来做。过去每年一到订规划，大家说一通，打开抽屉，算算还有几部书稿，分类一排就交差了，这就叫做没有政治思想性，没有同党的任务连在一起。现在必须改变。

规划期是一年（1978）、三年（1978—1980）、八年（1978—1985）。分期的主要要求，在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的有关文件中已经讲到了。要把这些要求具体化。今年是抓纲治国大见成效的重要一年，各项工作都要抓紧抓好。1978年的计划在2月7日前做完。计划要有文字说明，从形势讲到任务，说明我们的政治要求。光有书目不好讨论，有了文字说明就立体化了。2月7日以后一家家讨论通过执行。今年要大力开展组稿工作，要花大力气，为今后三年、八年重点书的编辑工作打好基础。如果现在不动手抓，三年后仍然会见不着书，我们要为实现长远规划积极作好准备。

在制订规划时希望大家特别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立足本社，面向全国。我们订规划，不能只着眼于一家出版社，而要考虑繁荣整个出版事业，要想到全国的布局。1978年一年的选题这样做困难大些，考虑本社自己的出书计划可能会多些。三年、八年的规划，更应看到全国；有全局观念。要考虑某省有那些方面的写作力量，可纳入计划；也可提议同地方商量，请他们组织写作出版某一方面的书稿。

二、从现实条件出发，先易后难。从规划的每一局部到规划的整体，都要先易后难。一般讲，遗产和已故作者的著作，比较容易制订规划，因为书都是现成的。如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集、选集，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的古典著作，科学名著，外国古典，中国古籍等。制订新著的规划比较难，特别是文艺创作。翻译书方面，外国现代思潮、流派有什么书可翻译出来，也不好掌握，因为这些年几乎情报断

档。国际形势，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事先也难以知道。因此，我们可以先搞前一方面的规划，后搞新著的规划。当然，这只是说规划工作的顺序，不是说新著不重要。出版工作座谈会以后，我们曾经和上海及在京几家出版社商量过分工，已初步达成三个协议，有待进一步商量，其中包括外国政治学术著作、外国古典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这为我们订好这些方面的规划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也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才能达成的。前几年就搞不成，因为背后有“四人帮”的御用写作组在控制着，出版社不便和我们商量，我们也尽量少惹点麻烦。商务、中华这几年没有执行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从选题到出书，也和好几家出版社有矛盾。最近情况变了，一协商就顺利地达成了这三个协议。

三、充分利用社会力量。要同各方面研究，同社会科学院各研究所、大专院校、翻译单位、领导机关、工农兵新生写作力量以及分散在社会上的写作和翻译人员密切联系。考虑选题时要听专家的意见，也要考虑工农兵的意见，开些座谈会，登门访问，广泛收集意见。我们委托出版社开些有关的座谈会，比方说，马列著作，请人民出版社和编译局开，古籍请中华书局开，外国文学请人民文学出版社开，音乐、美术请音乐出版社和美术出版社分别开些会。有些学科现在非常活跃，如自然辩证法，现在已成立了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筹委会，有了一个译书的初步规划。我们必须尽力配合。如有必要，出版局可出面协助，但主要靠各出版社。

四、社内也要走群众路线。要人人议论、动手，全体编辑都要投入规划工作，政工部门和出版、后勤部门也都要跟上来，予以协助。热心人士、用心人士会越来越多。要下大决心。出版局的同志也要同编辑同志多见面。因循苟且，得过且过，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不行。要大家都出点子，有不同意见可以辩论。搞规划对于培养队伍

有好处,可使某些同志对某方面的了解越来越深,越来越精。这不仅是业务训练,而且是马列主义理论的训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用马列主义观点去处理书稿。

我们要建立局、社两级规划小组。局一级规划小组,由出版局的同志加上五家直属出版社规划小组组长组成,下设一个办公室。社级规划小组,由党委负责同志和编辑室负责同志参加,还要有一个秘书。这样形成一个规划网。局规划小组是指挥部,社级是作战单位。要组织写作和翻译力量,主要靠出版社开展活动。今天就是建立规划网的会议。

这次规划着重是抓出书的规划,但也难免涉及体制问题,出版社布局问题,队伍问题,以及印刷、纸张等等问题,这些,另外再作考虑。

订规划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希望广大编辑出版干部积极动员起来,各出版社党委认真领导,把“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深入批判好,把规划工作搞好。

(1978年1月19日在国家出版局直属出版社
规划动员会上的讲话摘要)

最初一言

现在全党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上来，为了适应这个大转变，要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我们心中首先要有这个全局，然后考虑出版工作怎么搞好，编辑工作的水平如何提高，怎么适应这个新形势。

关于三审制问题。在国务院批转国家出版局《关于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报告》(1978年7月18日国发141号文件)中提到“要恢复总编辑、主任编辑、责任编辑三级审稿制”。141号文件的提法是否合适，可以重新研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41号文件提得不适当的，也可以提出来。回想一下，在我们起草文件之前，有人认为三审制是修正主义管、卡、压的东西，要把三审制全部否定掉。实际上这些人是要争一个终审权。不许你来终审，我来终审。141号文件规定三审制就是针对这种情况提出来的，但是否所有书稿一律都要三审，也确实值得研究。现在三审制形同虚设，有时二审没有看，三审也没看。出书要审查，这一点不能推翻。但用什么形式审查，可以因人、因书而异，不要等同划一。可以按作者的不同，书的不同而异。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首先责任编辑要加强责任感，勇挑重担。从组稿、商量提纲、看稿、审查、签字、发排、版面设计等等全面负责。编辑是战斗兵，又是指挥员。除此之外，有些疑难问题，可以和编辑室主任商量，和作者商量。剩下很少的问题拿到总编辑那里去共同商量、共同研究，最后由总编辑拍板。商量是

民主，拍板是集中。这样采取民主集中制的办法行不行？

另一个想法是采取研究所的办法，成立类似学术委员会的组织，我们姑且叫它总编辑会议或编辑会议。这是在党委领导下的总编辑会议，加上有关的编辑室主任，或者请有关的编辑室主任参加讨论有关的书稿，发挥集体智慧，集体领导。

现在我们直属出版社的领导，一人三任，党委书记、总编辑、社长，全是一个人担任，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究竟怎么办才好，请大家想些主意。对一元化领导应当如何正确理解？弄不好还是一个人说了算。

关于和作者的关系问题。胡耀邦同志讲的“文责自负”是很新鲜的。近30年来大家都不敢想这个问题。过去提“文责自负”就要挨棍子。编辑和作者的关系，应当是平等待人，不能强加于人。要热情帮助作者找材料，解决作者在写作过程中的一些困难问题。对于书稿不能求全责备，不要马克思怎么说，作者没有写，你就非要硬塞进一段不可。文化大革命前，我曾经给《前线》写过一篇文章。发表后，我一看90%都不是我的，只有10%和标点符号是我的。这样不行。编辑可以给作者提建议，但不能强加于人。耀邦同志讲“文责自负，毒草必锄”，我想是否再加上两句：“群众评议，佳作受奖”。这一点请大家多考虑一下。

至于书出了问题，最好不要追究个人责任。过去编辑跟着挨批评是常有的。千万不能搞追动机、查背景、找索隐、乱栽赃，硬说是影射了什么人，或者说为什么人“树碑立传”。有些问题是属于学术上有争论的问题，不要一点小事就搞成人人都是反革命。审查人的问题，不能扩大化；审查书也同样不能搞扩大化。一个出版社的一本书有问题，就不要扩大到十家、几十家出版社都要查出同样或类似的问题。这是纯粹的形而上学。

还有一个问题，“文化大革命”以来，人人都有权禁书，这是不行的。过去只有中宣部才有权禁书。

不应当搞作者政审。我们有一个出版社，三番五次地向作者单位要作者的历史材料，包括作者的父亲、家庭、社会关系以及祖宗三代等等，把作者单位搞烦了，最后干脆一股脑儿把作者的一大叠档案都寄到出版社来了，“你们看着办吧！”这不是出版社给自己找麻烦吗？当然对于完全不了解的作者，问一问情况是应当的。但是，有的单位的回答可能是：“此人有名利思想”，“此人走白专道路”，“此人生活上还有一些问题”等等。对于这种种说法，可以听，但是，最后还是要由出版社自己分析、研究，自己决定就可以了。

关于署名问题。以前知识分子“臭老九”写书不能署名，工农兵倒可以署名，这也不是个办法，作者为什么不可以署名呢？责任编辑也可以署名，署在哪里都可以，这对编者也是个促进。有个同志对我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先例。我说，你开个头，不就有先例了吗？

关于编辑职称问题。不在于名称如何，在于真才实学。我想，总编辑、编辑室主任是由行政上任命的，职称应由群众评定，由领导上授予。职称包括的人员是窄一点好，还是宽一点好，还是仅仅限于编辑，可以讨论。对编辑室主任，能不能采取选举的制度，不妨先从选举编辑室里的组长试试看。编辑在社会上的地位问题，这首先要自己重视。和科研、教学人员可以相比，也可以不比。现在有不少编辑，人心思“院”，思“所”，不愿在出版社。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才能吸引人家愿意来做你的工作。教授、研究员、编辑的工作就抽象劳动来说，都是智力劳动。就具体劳动来说，有人上讲台讲课，有人搞学术研究，有人做编辑工作。要完全一视同仁，也不大可能。非要在编辑人员中多安排几个人大代